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

王锺陵

内容提要 当戴望舒从新月诗风中回到自由体时,与其说他是将一定的格律因素揉合到自由体中,不如说他是将散文因素融入了韵律之中。后一说法才能揭示出现代诗派从格律派中蜕变出来的情状,并且也才能说明它所体现的新诗史前进的实质之所在。新诗研究界所盛行的将《雨巷》与《我的记忆》按追求音乐性与反对音乐性的区分而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代派在其兴起中与当时诸诗派有着清楚的蜕变、讨伐、别异的关系。《望舒诗论》便是这一派诗人寻求自立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望舒诗论》是这一诗派诗论的第一阶段,那末施蛰存、金克木诸人之论便代表了它的第二阶段。在对于诗的认识上,在诗的表现艺术上,施、金之论,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现代派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并不与西方现代派相符。在西方现代派所优厚的声音与意象两项中,中国现代派取了意象,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舍去了声音,至少是在格律的意义上舍去了诗的音乐性。在意象上,则又主要是取了一些表现技法,而取不来其宗教感与对于世界的一种博大而苍凉的荒原感,也缺乏对于现代都市病态的深刻揭示。

关键词 《望舒诗论》 金克木 西方现代派 散文化 中国现代派诗论

王锺陵,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15021

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的诗论,新诗研究界至今仍缺乏与西方现代派诗论相对照的研究。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对中国现代派诗的特点、功过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其与西方现代派诗论的相异之处,均缺乏深入的理解。有鉴于此,本文从中西贯通的新视野出发,在对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作整体说明的同时,重点对其所受西方现代派诗论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异的地方作出辨析,从而对其特点、功过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作出新的梳理。

—

1932年以后,以戴望舒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诗派风行一时。这一诗派是从徐志摩、闻一多诗风中蜕变出来的。杜衡说,当时我们“谁都一样,一致地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地可

论江苏“紫金山文学奖”获奖散文

周红莉

内容提要 江苏“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是观照江苏散文的重要视窗。本文以四届共二十篇获奖散文为研究对象,根据题材、内容、题旨等的不同,从记忆、文化历史与思想方面,检视“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的基本内存,论析获奖散文的特质与价值。

关键词 “紫金山文学奖”获奖散文 记忆 文化历史与思想 江苏作家

周红莉,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常熟理工学院副教授 215500

“紫金山文学奖”是江苏作家协会设立的地方性最高文学奖项,被称为江苏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首评于 2000 年,初为五年一评,后改为三年一评,至今已评出四届。作为江苏当代文学事业发展的实录,“紫金山文学奖”已成为我们观照行进中的江苏文学有意味的视窗。散文奖是江苏“紫金山文学奖”内设的重要门类。以获奖散文为论题,从某种角度而言,可以反映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十余年江苏散文的总体存在、形态品格和基本价值。这里,我们根据题材、内容、题旨等的不同,主要从记忆、文化历史与思想方面检视“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的内存,论析获奖散文的精神要素和表达形态,由此也可看出江苏散文在中国散文版图中的地位。

记忆是一种回望。记忆写作是一种通过个人化回忆写作的方式,将过往经历过的人与事还原复现出来,作家在回望过去中能够很自然地徜徉在自己的记忆之园中,那些通常并不在意的生活琐事,一旦进入“忆域”会变得有滋有味。就文体的特长功能而言,散文的个人性和个体经验的纪实性,特别适合于记忆写作。鲁迅就说过,他的《朝花夕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1]。虽则记忆是一方个人化的园地,但其空间甚大。周作人有言:“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有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2]江苏散文作家正是这样。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侧重,耕耘播种于自己的“园地”,追求真实的人生体验,追求生命主体的真性情。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江苏散文研究”(项目编号:12ZWB009)、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散文三十年研究(1979-2009)”(项目编号:2010SJB750001)的阶段性成果。

[1]鲁迅:《朝花夕拾·小引》,《莽原》第 2 卷第 10 期,1927 年 5 月 25 日。

[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李晓红

内容提要 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就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哲学与翻译诗学相互渗透交融,形成宏观的文学翻译诗学,具体实现路径包括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明确文学翻译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将文学翻译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追寻文学翻译文本中权力话语的作用;建构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等。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语言哲学 文学翻译 翻译诗学 主体性 意义再生 权力话语 翻译伦理

李晓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教授 311231

一、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

1930年,德国哲学家摩里兹·石里克(Moritz Shlick)最早对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进行了理论描述,他在《哲学的转变》中指出:“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1]1956年,分析哲学运动开始之后,维也纳学派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在《逻辑与实在》一书中最初明确使用“语言学转向”这一术语。1967年,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用这一术语命名他的一本论文集《语言学转向》,使得这一倾向得以凸显。1979年,新哲学解释学的创立者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哲学主要趋向》中指出:“这种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语言学转向更加成为一个通行的用语^[2]。

与“语言学转向”术语相适应,“语言学转向”这一哲学文化思潮带来了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的现代语言哲学的产生。在古希腊,没有“语言”这个词,语言被称作“逻各斯”,两千年来,西方学界一直

[1]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2]转引自赵奎英:《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页。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 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李兴阳

内容提要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其“乡土现实”题材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土地问题”和“乡土生态与环保”等八个叙事“热点”。每个叙事“热点”都是对中国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关键词 新世纪 乡土电视剧 现实发现 叙述选择

李兴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23

中国乡土电视剧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进程的不断加速，出现了被边缘化和日渐萎缩的“历史大趋势”。在新世纪 10 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乡土电视剧虽然未能改变自身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也出人意料地走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低谷，迎来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为“荧屏中国”吹进变革时代的乡土气息。这既是直面“三农”问题，推进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国家意志的视听叙事表达，也是中国乡土电视剧对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新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3 年国家取消农业税，2005 年再度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1]，中国乡村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文化形态、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农民精神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叙事视域不断拓展，题材不断丰富。概括起来看，新世纪中国乡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世纪中国电视剧与民族国家想象》(项目编号 10BC024)阶段性成果。

[1] 200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会议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保守、创新和冒险的三重奏

——检视“解严”以来台湾商业电影的发展

孙慰川

内容提要 1987 年“解严”以来,在外国电影的残酷挤压下,投资者对台湾本土电影的市场前景不抱乐观预期,故台湾商业片绝大多数是中低成本的,在类型选择上也趋于保守,通常选择本土观众接受度较高的喜剧片、青春片、恐怖/惊悚片等。至于商业大片,成功的个案不多。商业片的岛外合资方主要是美国和香港。近年来,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重要、市场潜力最大的商业片合作伙伴。

关键词 “解严” 台湾商业电影院 保守 创新 冒险

孙慰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学系教授 210097

在海峡两岸乃至世界范围内,对台湾电影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艺术片。一些人甚至形成了刻板印象:台湾只有艺术片,没有商业片;或者,台湾的艺术片是应该关注的,而其商业片则不值得研究。这是对台湾电影的一种误读,一种偏见。它使得我们对台湾商业电影的研究极为薄弱。

本文将研究“解严”以来的台湾商业电影,这是因为:首先,台湾当局在 1987 年解除了已实施 38 年之久的戒严令(简称“解严”),这是当代台湾历史的一个重大拐点,也是台湾电影发展史的重大转折点。其次,以前,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外国影片进口台湾要受配额的限制,并且每部外片在台湾只允许发行 3 到 5 个拷贝。因此,外片对台湾商业片市场的冲击比较有限。但 1986 年,台湾取消了外片配额措施,并陆续放宽了每一部外片在台发行的拷贝数量和上映的影院数目。这对台湾本土电影构成了致命的打击。简言之,“解严”前后,台湾本土商业片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直接并显著地影响了本土商业片的类型、格局和行销方式。

一、本土资金制作的商业片

台湾总人口 2300 万,电影市场的规模不算大。再加上 1987 年以来外国电影的强势冲击,令投资者对本土电影的市场前景不抱乐观预期,一般情况下不敢贸然投拍大片。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台湾本土资金制作的商业片绝大多数是中低成本的(投资规模在 1000 万元新台币左右);而且在类型选择上也趋于保守,主要投在本土观众接受度较高的喜剧片、青春片、恐怖/惊悚片和情色片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87-2009 台湾电影研究”(立项批准号:10BC029)的阶段性成果。

视觉人类学与中国肖像摄影研究

夏 羿

内容提要 人类文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媒介时代,当人手一部照相机时,何为真正的摄影就受到了认真的追问。照相机不再是稀有之物,人人可以自娱,肖像摄影作为最传统的拍摄方式,拒绝了新图式和视觉冲击力的诱惑,成为精神化身。肖像创作的实践过程、拍摄手法、作品立意、文本解读、影像价值,甚至气质都可以在视觉人类学中找到踪迹,借助视觉人类学科学与艺术的双重特性,可以把肖像摄影放在更宽广的学术空间审视。

关键词 视觉人类学 肖像摄影 人类学方法

夏 羿,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210000

摄影进入当代,大量的肖像被生产,符号化的人物面孔之下,容纳了更多新的意义。肖像摄影创作者借助肖像形式更加积极地对社会人类文化现象进行诠释,同时在视觉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上实践创新。本文旨在将肖像摄影置于新的学科视野下,擢升摄影意义,从中发现视觉人类学与中国当代肖像摄影的某种内在关联,以科学地拓展肖像这一摄影门类的发展。

一、中国肖像摄影的视觉人类学维度

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是一个较为新近的科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着力于研究人类行为视觉维度的方方面面。中国视觉人类学实践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但作为学术理论研究对象较晚。第一本理论著作是1989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的美国学者卡尔·海德写的《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国内学者撰写的《影视人类学概论》一书2000年问世(张江华、李德君等著),书中第一次试图给出“影视人类学”的定义:“影视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研究中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手段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征、分类和制作方法的人类学分支科学。”^[1]学者庄孔韶指出:“Visual Anthropology 是以影像和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2]虽然目前学界对于“视

[1]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2]庄孔韶:《什么是影视人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1月25日,第11版。